

浅谈拉美地区土著族群的社会抗争

马瑞阳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 20世纪90年代土著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在拉美地区广泛兴起,所涉议题包含身份认同、基本权利、环保倡议、发展诉求及政治参与,土著族群的社会抗争正在重塑拉美地区的政治生态。本文旨在初步探索拉美地区土著族群抗争运动的成因和进程,从抗争的历史背景入手,以厄瓜多尔为案例分析土著组织在关键事件采取的行动和获得的效果。本文发现,通过一系列的抗争运动,土著族群的政治参与更加深入和多样,对国内政治局势和国家事务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关键词: 土著族群 社会抗争 土著组织

一、历史背景

历经从殖民地到独立政权、军人执政转向民选政府、经济制度调整 and 一系列社会改革,拉美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仍处在动荡之中,“危机频发”是拉美地区的一大特色现象。上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相继出现了民主化浪潮,以工人、农民和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为主的公民社会团体出现并逐步活跃于政治舞台。土著族群作为拉美原住居民,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数百年受到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由于其语言不通、保持原始的生活传统以及居住在偏远地区,在各国独立后仍然处于不受重视的边缘群体,也被广泛认为是拉美社会地位最低下的群体。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受经济萎缩、国际油价下跌影响,拉美国家财政收入普遍缩减,失业率大幅上升,薪资购买力比率下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及政府大规模裁员。诸多弊病在社会各个角落积攒下的矛盾愈加突出,与衰败的社会经济相对应的是工农阶级高亢的斗争情绪,产业工人和农民主导的抗争屡见不鲜。除了社会各阶层和各族群自身面临的困境,充斥着动荡、愤怒和不满的社会氛围。为了改善生存环境和条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等国出现了多次反对社会不公的抵抗活动,工农阶级的斗争取得一定效果,而土著族群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纵观全球因能源开采和生产引发的社会冲突,有五分之一出现在拉美地区,其中厄瓜多尔的情况尤为突出,其人口仅占拉美总人口的4%,而8%的冲突事件发生在此。¹因能源开采、生产、运输和利益分配引起的土著族群与能源企业、政府及其他社会群体矛盾不断加深,催发了自上世纪90年代土著人社会运动大潮。厄瓜多尔的土著人运动被普遍认为是拉丁美洲国家中最激烈的代表。

二、文献回顾

国际学界关于土著族群抗争的命题围绕社会运动、公民社会团体的观点,有安东尼·贝宾顿等人提出,参与社会运动是拉美土著人能够直接影响国家决策并推进权力结构转变最重要的途径,也为普通人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机会。²根据查尔斯·蒂利的观点,社会运动从宏观看来是基于组织、网络、传统和凝聚力,持续地表达诉求、重复地宣传来抗争以实现目标。微观看来则是“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诉求伸张运动”、“一系列的诉求表达”和“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呈现”。³凯克与辛金克指出,在公共政治领域不平等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一方面,社会运动将国家政权推向了民主化的反面,参与者的范围被缩小了;另一方面,不断出现的新议题、新团体、新策略和新目标将社会运动推向专业化发展,其可利用的机会和资源减少,土著人组织有关大众诉求的代表性降低。沃伊切赫·奥斯特洛夫斯基指出国际组织和援助机构“对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公共事务以体现其对发展公民社会的支持”的迫切需求使非政府组织的权力、能力和财力都有所增强。⁴亚沙尔·黛博拉将土著人抗争政治的发展归结为三个条件的有机结合:一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改善了公民政治权利;二是自由集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增加;三是区域性、全国性和跨国性非政府组织和网络的形成有效扩大了运动的规模和效果。⁵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戴维·马拉斯从当地社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角度提出,相对偏远的地区正是土著人集中的地方,同时又是重要资源的宝库,中央政府认为这些资源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一个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地区,原住民群体的身份与民族自决的要求间的冲突被扯进与国家声称拥有资源所有权的冲突中。公民对政府提出解决所面临的威胁的要求满足了不断扩大国家权威和权利的欲望,挑战和回应的结合造成了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国内分化加剧,为了权利想要超越法治的意愿增强。⁶

三、厄瓜多尔案例

1990年5月27日,160名“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盟”(简称CONAIE)的成员占据了基多的圣多明戈大教堂,要求政府立即解决六个山地省份的土地纠纷。次日,1000名来自近70个组织的土著人代表在基多向博尔哈总统请愿,提出了包括土地权合法化、依据农业改革法案行事、宪法承认多民族国家在内的16个诉求。其后一周内,玻利瓦尔、钦博拉索、科托帕希、通古拉瓦和皮钦查五省同时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整个厄瓜多尔停摆,仅玻利瓦尔省就有超过5000名抗议者参与占领省会瓜兰达市政设施、切断供水和交通的活动。

“乐施会”(Oxfam)等非政府组织还协助CONAIE进行宣传和动员。⁷军队和警察与示威人群发生冲突,钦博拉索土著运动领导人奥斯瓦尔多·库威(Oswaldo Cuwi)身亡。同年6月8日,面对国际社会的政府武力镇压的谴责,博尔哈委派农业改革部部长为政府代表,基多天主教为调停人,CONAIE核心人物路易斯·马卡斯(Luis Macas)为土著人代表进行了11天的闭门谈判,最终抗议者撤出大教堂。政府随后成立了土著人事务办公室,恢复了对双语教育的财政拨款。⁸

1990年的这场全国性运动被称作“点燃稻草堆的火苗”,随即蔓延到亚马地区并引发了1993至1994年东部亚马孙土著人反跨国石油公司大起义。1996年CONAIE中分化出了政治组织“帕恰库蒂克”(Pachakutik)参与工会活动和地方机关的竞选活动。自其1996年参与地方选举以来,由最初获得两个成员就任市长,到2019年参与5个省的管理并有19人当选市长,政治参与策略极大地提高了土著族群在地方和基层政权中的势力。

2001年1月土著组织抵制诺沃亚(Gustavo Noboa Bejarano)政府的私有化改革,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长距离游行和封堵道路,占领了钦博拉索省的电视台和电台。政府随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出动军队和警察维持局面。2007年11月,土著人的抗议活动占领了达育玛镇(Dayuma)的数座油井,要求政府支持土著社群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科雷亚当局调动军队控制局面,最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拘留了23名参与抗议的活动人士告终。⁹

四、社会抗争的成因

拉美地区普遍存在诸如生产资料分配不平衡、社会不平等、经济发展迟缓、外债高筑等问题。土地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长期制约独立以来厄瓜多尔社会经济发展。上世纪60年代,军人政府也在各地区推行农业改革,西方石油公司进入亚马孙地区进行石油地

式勘探,发现了大量油田并随之进行开采和运输。随着石油活动和农业垦殖范围的扩大,当地受到影响的土著居民被迫迁移至别处,土著族群中出现了丧失土地的担忧和对经济活动扩张的抵触情绪。1954年、1974年、2000年三次农业情况普查显示有25%以上的生产者拥有的土地少于1公顷,且仅占农业用地总面积的1%;生产者中拥有土地最少的群体是土著人。87%的土著人口都从事耕作,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65公顷,不足非土著人口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¹⁰从普查数据来看,这个情况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都没有改善。土地减少和生活区域的缩小,是土著族群首先面临的挑战。对于土著人诉求的回应,农业改革的政策将土地再分配的条件与农民身份捆绑,即农民才有获得土地的合法资格而非“印第安人”。

由于石油贸易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转变,大量农村农业资本向城市工业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的大地主和农场主进入城市参与工业生产,并获得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举措并未有效改善土著人的土地分配情况。民选政府执政后,新的社会经济变化受到工人、农民和社会下层群体的强烈抵制,在全国上下左翼力量联合的大环境下,土著组织也将抗争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990年后政府实施了由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和紧缩政策和土地引起的阶级冲突加速了抗争的进程。

五、结论与思考

土著族群的社会抗争从乡村到城市、从本地到域外、从现实到网络,对厄瓜多尔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外部力量的支持、西方价值观渗透、经历了流血冲突和暴力镇压,土著人的政治参与更加深入和多样,对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了一支能够影响政策、立法乃至政权更迭的力量。回顾厄瓜多尔的社会抗争,人们并非反对市场本身,而是反对强者操纵市场,伤害弱势群体,迫使后者支持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

马瑞阳(1991.10),男 回族 宁夏银川人 学历:研究生 职称:助教,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

参考文献:

[1]Eisenstadt, T., and K. J. West, “Public opinion, vulnerability, and living with extraction on Ecuador’s oil frontier: Where the debat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ism gets personal”,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49, no.2, 2017, pp.231-251.

[2]Bebbington, Anthony J., Samuel Hickey, and Diana C. Mitlin, (eds.), *Can NGOs make a difference?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Zed Books Ltd., 2013, p.65.

[3][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

[4]Ostrowski, Wojciech, “The rise and limits of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and gas*,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87-107.

[5]Yashar, Deborah J.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Latin America: The Rise of Indigenous Movements and the Postliberal Challe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60.

[6][美]戴维·马拉斯著,刘捷等译,《拉丁美洲与和平幻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7]Williamson, John (ed.) (1990),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Sánchez-Parga, José (ed.) (1993) *Etnia, poder y diferencia en los Andes septentrionales*. Quito: Abya Yala.p55

[9]Robinson, William I, *Latin America’s radical Left: challenges and complexities of political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pp.130-133.

[10]Munck, Ronaldo. *Rethinking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 hegemon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Springer, 2013, pp.246-260.

(上接第178页)

能,如课程资源共享、学术研究资料、科研讨论、作业、测试、在线视频、聊天社群、通知等,增加导师与学生、学生间的关注度和密切度,弥补有时线下沟通的不便。

4.设立第三方调解组织协助解决师生相处中的问题和矛盾

导师在指导学生时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矛盾,有时双方后续可以通过良好的沟通自行解决,但有时双方由于某些观点存在巨大差异,如是否须延期毕业,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是冲突。如何处理好双方的摩擦,是促进两者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可能会导致研究生培养任务无法顺利进行,甚至会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在思想或行为中走向极端。为了有效解决两者产生的分歧,笔者以为学校应在校级层面上设立第三方调解组织协助解决师生相处中的问题和矛盾。该组织作为双方沟通的桥梁,应在充分了解矛盾双方各自诉求的基础上,以中立者的身份,进行客观评判,并让师生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有效对话和沟通,促成两人在目标和思想上形成统一。如果双方争议依旧无法解决,则学校应及时启动的导师更换机制,即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求,重新给他匹配符合他情况和要求的导师以帮助他完成研究生培养任务。

5.加强导师自身师德、师风建设

如前所述,研究生阶段的培养不仅在学术上“传业授惑解道”,更应该对其生活和情感方面给予指导,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生活观和感情观,为其毕业后能够顺利融入社会铺平道路。为此,德育教育在师生交往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所谓“言传身教”

就是要求导师应首先加强自身师德、师风建设,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加强教师的责任心。平时,导师应注意自己言行,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标准,为学生的行为做表率,这包括学术上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生活上乐于助人的作风、理想上热情积极的态度。导师的这些言谈举止必然会通过和学生的接触,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构建良好的心理状态,形成完善的人格。

参考文献:

[1]张静文,刘爱书,研究生导师问题行为的现状及特点探究——基于黑龙江省高校研究生的调查分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年第4期。

[2]刘志,研究生导师和学生关系问题何在——基于深度访谈的分析[J],《教育研究》2020年第9期。

[3]郭楠,硕士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调查研究——以西安市为例[D],西安外国语大学,2019。

[4]戴桂玉,论研究生培养中导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J],湘南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5]2021年中国研究生培养单位、招生人数、在学人数及毕业人数分析:招生人数达117.7万人,其中工学占35.58%,<https://www.chyxx.com/industry/1100942.html>。

本文作者:阎其华,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邮箱 yanqihua@sina.com